



## 重要言论

要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强化对反腐败斗争全过程领导，坚决支持查办腐败案件，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纪委监委作为专责机关，要更加主动担起责任，有力有效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整合反腐败全链条力量。各职能部门要坚持高效协同，自觉把党中央反腐败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

## 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为人民谋幸福

□ 唐国军

陈云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贡献了巨大心力和智慧。在参与领导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陈云不仅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就我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对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我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来自多方面的干扰，陈云十分尖锐地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性质、朝什么方向走的根本问题。对此，他的回答简洁明了：“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在陈云看来，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最根本的规定，是中国式现代化须臾不能偏离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根本方向的规定之下，陈云明确指出：“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陈云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作的“社会主义的”认定，植根于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心。他一再讲“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并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当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水平上差距很大，陈云仍坚定地指出：“中国

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正是从确保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出发，陈云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必须同时“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他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大问题”，反复强调“两个文明要一起抓”。针对当时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陈云警告说，“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后来成为指导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大和基本的原则。

陈云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根本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不仅在原则上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而且具体地指出党要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集中统一领导。他通过总结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并结合其他国家经验教训深刻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他告诫搞“诸侯经济”“四化没有希望”，“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陈云极为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就党面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考验向全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他告诫：“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并作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大论断，强调“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倡导在全党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强调要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坚决刹住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强调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部，指出“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

题”的重大论断，强调“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倡导在全党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强调要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坚决刹住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强调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部，指出“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

## 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陈云认为，搞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这是陈云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根本目的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大规模的建设任务，陈云反复提醒“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后来他将这一观点凝练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先生活，后建设”，这无疑是对苏联教训的重要纠正。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提出要让个体私营经济继续存在、共同发展，建立一种真正“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后他多次强调：“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继续讲：“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陈云高度重视工业化过程中的环

境污染和水资源保护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陈云提出防止工业污染是一个应当“尽早注意”的问题。他说：“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患于先，这是重大问题。”针对个别地方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的情况，他疾呼：“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陈云深刻认识到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时说：“搞四个现代化，农业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农业不过关，工业就跑不快。过去几次工业下马，都是农业扯后腿。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粮食稳住了，其他都能稳住。粮食一涨价，其他都要涨。开始不懂这个道理。全国解放前夜，我到了上海，那时物价还在上涨。我们研究之后，从各处调来了粮食，后来物价就逐渐稳定了。”

对于粮食安全，陈云讲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话。比如，“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晚年他反复念叨的几件事，一件就是粮食安全，常告诫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我们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是要出乱子的，要出大乱子的”，要求“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下转3版)

## 激发以乡村治理新动能

□ 翟玉晓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不仅起到了“孕育者”的作用，还发挥了“守护者”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中包含着农耕文明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思想内容，是激发乡村治理活力的重要抓手。在推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要不断挖掘和培育乡土文化，积极发挥其崇德向善、凝聚共识、内化自律的作用，努力构建党委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村民互动自治的多元共治格局。

挖掘优秀乡土文化，筑牢文化根基。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具体表现，以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载体，如家风家训、祖庙祠堂、村规民约、族谱村志等，彰显乡村风俗礼仪、价值规范、道德标准，为群体成员间的文化和情感沟通提供公共空间和承载。这些载体是群体成员身份与情感认同的象征，是共同的文化记忆，在此基础上传承发展的乡土文化具有了家族伦理、人情礼俗的特质，在日常生活中融入乡民的思想深处，渲染着浓厚的乡思乡情乡愁，给人以厚重的集体归属感，能够起到凝聚村民共识、加速社群黏合、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作用。一是对其文化内涵特质甄别提炼，发掘其中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有益文化元素，推动传统乡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其与现代文化和现代治理规则的有效结合。二是制定专项开发和保护政策，形成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乡村群众、社会组织为主体的长效工作机制，重视对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利用灵活丰富的形式推介宣传道德模范事迹和美德善行，激发村民群众对于家乡的浓厚自豪感和荣誉感，营造良好的文化传承氛围，实现乡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发展。三是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收集各乡村历史传承下来的乡土文化资料，整理好祠堂、族谱、碑文等历史文献，建立系统的历史文化档案库。可以通过建设乡村历史文化馆、开办乡土文化论坛、开展民俗节庆活动等文化展示设施和交流活动挖掘、宣传乡土文化，讲好美德故事，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勤俭务实、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因子发扬光大。

搭建平台桥梁，发挥文化“软治理”作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是社会组织如何重构，即怎样由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公社制”和“街居制”的组织方式，转向更加精细化、多元化的社会团结形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基层治理中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基层自治组织，以此汇聚文化资源、搭建良好平台，在社会关系调节中更好地发挥乡土文化的“软治理”作用。因此，新时代基层治理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法治精神、依托法治框架，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并充分激发其调解矛盾纠纷、引导文明生活新风尚的功能。一是提高村民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作为一个社区共同体，村落的价值既是制度意义上的，又是心理意义上的。通过对维护乡土社会集体记忆的各种载体的挖掘，凝聚乡村作为文化共同体、心理共同体和制度共同体的情感和共识，构

建乡土社会文化共识的现代场域。二是开拓乡土文化资源的多元化传播路径，依托新兴传媒技术，挖掘乡村社会的新生态、新发展、新动向，搭建起城乡互动交流的数字化桥梁，为乡土社会价值的正向传播开辟新的渠道。三是发挥文化“软治理”功能。汲取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孝为先”“和为贵”“无讼”“亲邻和睦”等治理智慧来丰富工作手段，综合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途径，及时化解农村征地拆迁、工资拖欠、劳动纠纷、非法集资等矛盾隐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就地化解”的治理效果。

注重多元治理，积极吸纳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治理。新时代乡村道德模范、优秀基层干部、致富带头人、知识分子、退休官员、退役军人、毕业返乡大学生等群体，大多具有文化、物质、声望等优势，且拥有根植乡土、热心奉献等特点，是村民之间“熟人”的典范，在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乡土社会中能够担负起社会关系协调者的职责，在纠纷化解、扶贫助困、公益慈善、产业规划等乡村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作为乡土文化资源的传承者、群众致富的领路人，乡土人才所崇尚和践行的仁爱孝悌、见贤思齐、克己勤俭等传统文化特质，发挥着教化村民、凝聚共识、定纷止争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优化乡土人才发展环境。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方式，推选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办事公道的人员成立议事协商会、纠纷调解协会、文化传承交流协会、移风易俗议事会等社会组织，促进政府和群众间的互通互信。另一方面，积极发挥乡村能人反哺桑梓、凝心聚力、教化村民作用，培育发展基层自治组织，鼓励他们广泛参与乡村治理。着力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使乡土人才真正成为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乡土能人在经验、资金、人脉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回乡经济，吸引本乡人回家投资和干事创业，以成立本乡人参事议事会等方式引导其参与村级事务商定，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 治人——《资治通鉴》中的廉洁文化

□ 赵璐璐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宋神宗觉得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历时19年编撰完成，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指出，编写此书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选取的是与治国理政相关的历史内容，核心都是为君之道和致治之道。《资治通鉴》成书后不断受到推崇，是一部无论对于治国理政还是修身齐家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史学经典著作。

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对于与个人品质和为官治国均极为重要的“廉”自然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在中国古代，“廉”本义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古人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义利观，是在价值观的标准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种义利观和道德伦理指导下，士人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其基本要求就是廉洁从政，进而树立能够影响整个政治文化氛围的立身为政导向。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等编纂记录了历史上清廉自足、廉洁从政的不少人物。如，汉景帝时期的官员郅都：“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郅都为人为官廉洁无私，在地方任官时，从不收钱物，也不接受私人的请托，后来被汉景帝调到长安任中尉，负责京师的安全。五代十国时期，蜀国的蜀州刺史王宗弁称疾辞官，蜀主怀疑他是对官位不满，于是加授其检校太保，但王宗弁推辞了，云：“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岂可求进不已乎！”表明自己并不谋求高位，守廉自足是他的本愿。蜀主嘉许其志向，于是准其退休。廉与贪相对，廉而不贪，所指并不仅仅是财物，更是包括权力、社会地位等。《资治通鉴》作者所关注的“廉”，更多涉及对权力的认识和使用，这样一种“廉”、廉而有节，自然是优秀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从政治国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东汉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秋，南匈奴一部分起兵反叛，攻打美稷县，东羌也有响应起兵的部族。当时张奂作为安定属国都尉刚刚到任，军营中只有200余人，但得到消息后，立即决定出兵，断绝了南匈奴与东羌的交通。于是，东羌诸部相继投靠归附，边疆区域得以重获安宁。东羌诸部族的首领赠送张奂20匹马、8对金耳环。张奂召集东羌首领，将酒洒在地上，说：“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即便送的

(下转3版)